

马克思主义 与 中国社会主义实践

MA KE SI ZHU YI
YU
ZHONG GUO
SHE HUI ZHU YI
SHI JIAN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

马 克 思 主 义
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

上海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

1990.12.

**马克思主义
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

上海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上海分社出版
(上海古北路650号)

新华书店经销 常熟第四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 170,000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7-5000-0323-4/A·1

定价: 3.00元

国内发行

主 编 林炳秋
武克全

责任编辑 杨秉岩

封面设计 唐 忠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

前 言

我们奉献给读者的，是上海社联在建国四十周年之际举行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四十年”多学科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选编。

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制度在一系列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开创了人类社会最伟大变革的历史进程，雄辩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正确性。然而，七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也表明，马克思主义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指导原则和方向，但是，各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没有任何现成的固定模式，因此，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与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社会主义的理论变为现实，还需要当代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各国人民进行不断的探索。这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共产主义现在已不再意味着凭空设想一种尽可能完善的社会理想，而是意味着深入理解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93页）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摆在他们面前的任务，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本国的实际出发，独立地、创造性地探索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

四十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在一个人口众多、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实现社会主义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探索，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提出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实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从而成功地实现了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并在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可是，在这之后的社会主义

实践中，也犯了一系列错误，不仅强化了建国初期形成的高度集权的经济政治体制，并且发生了“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挫折，造成了人力、资金、资源的巨大损失，贻误了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时机，妨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这些错误的发生，具体原因比较复杂，但最重要、最根本的，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思想的基础，是以对它的完整、准确理解为前提的，对它的基本原则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见《共产党宣言》第11页）1956年以后，在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上，正是由于违背了上述原则，从立即建成社会主义的主观愿望出发，无视现实基本国情的制约，或者曲解马克思主义，或者用教条式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从而导致了一系列急于求成、超越阶段的全局性失误的发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之所以能开创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局面，根本的原因，就在于通过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社会主义具体实际相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总结建国四十年来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最重要的，就是要总结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经验。

如同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一个不断的探索过程一样，要具体而又深刻地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也必须进行长期的努力。因为凡是科学的符合实际的历史经验，决不是表面现象的罗列，而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反映，属于多层次的理论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具体实际结合的历史经验，不仅涉及到如何全面、准

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还应包括在中国历史条件下怎样具体运用的问题。因而，总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经验，实际上是一个以社会实践为标准，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深入研究中国历史的和现实的国情的过程；并把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提到理论的高度加以思考，全面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规律，进一步阐明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应该说，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理论界已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许多重大的理论成果。但这还不能说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具体实际相结合中的各种问题的认识都很清楚了。当前的实际情况是，我们无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还是对社会主义社会本质和规律的认识，都需要进一步加深；至于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工作的特点和具体规律性，还有大量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有待于作深入的探讨。这都是摆在我们理论工作者面前的重要任务。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组织了这一课题的讨论，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这本论文集，以推进这方面的研究。

本书取名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目的是为了突出主题。这本来应当是一部内容丰富、层次分明的专著，但因为它是论文选编而成，就难免有较大的局限性，不可能顾及到所有的方面。收入本书论文的观点，都是作者个人的见解，当然不能苛求它们都是成熟的，如果它们能对人们这方面的思考有所启迪的话，那我们的初衷也就达到了。

林炳秋 武克全

目 录

前言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姜义华	(1)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四十年·····陈章亮	(16)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完善地方政权建设·····齐乃宽	(23)
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形式 促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浦增元	(35)
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理论发展的历史回顾·····周尚文	(45)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特征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张淑智	(53)
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特征理论的坚持和发展·····陈昌玖	(62)
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一般与特殊	
——兼谈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理论在我国的运用和发展·····王国平	(71)
马克思主义按劳分配理论在中国的实践·····顾雪生	(78)
对建国以来我国农业三次徘徊的反思	
——兼谈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郭加复	(89)
苏联模式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姜 琦	(99)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时间、基本	
特征及其发展趋势·····徐永祥	(119)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与提高中华民族素质·····余 立	(127)
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与社会主义教育目的·····张家祥	(137)
坚持教劳结合 培养社会主义新人	
——兼谈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的经验和教训·····古人伏	(146)

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四十年·····	贺世友 (159)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四十年·····	杨大钧 (170)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命运·····	李华兴 (179)
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丁水木 (189)
实事求是的学风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刘修明 (194)
四十年“理论联系实际”的反思·····	李君如 (203)
认识“国情”不能脱离“世情”·····	余源培 金玉琅 (211)
编后记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 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姜 义 华

历史是人能动的创造活动。一个半世纪来，中国人为推进中国的社会变革，使中国走出传统的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建主义社会及后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实现现代化，使中国摆脱贫困、落后和屈辱地位而自立于世界文明民族之林，经历了千辛万苦，寻找先进的世界观、科学的方法论，力图用先进的思想武器武装自己，以使自己创造历史的能动活动比较自觉，比较主动，比较顺利，避免较大的挫折与反复。

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人信奉过基督教的天国福音，信奉过进化论与天赋人权论，信奉过形形色色的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道德救国的理论，信奉过各种流派的国家主义、第二国际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从实践中，中国人民逐步认识到，所有这些思想武器都不足以指导中国社会大变革真正成功。只有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的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才是中国历史发展所必然选择的指导社会大变革的最锐利的思想武器。

一、历史在西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比较中作出抉择

近代中国救国治世的方案形形色色，大要分作三大流派，一是移植西方近代化、现代化模式于中国的西化派，二是力图保全和弘扬中国传统社会政治、道德、文化乃至经济构造的传统派，三

是对西方近现代与中国传统社会都持批判态度而努力在此基础上开辟现代化与后现代化新路的马克思主义派。当然，在这三大流派之外，也有企图用各种办法在西化与传统之间折衷调和者，也有对东西方都持批判态度并企图探求新路但未走到马克思主义阵营者。

向西方学习，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成为先进的中国人共同的呼声。早在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洪秀全等人通过传教士的介绍，朦朦胧胧地知道了一点基督教教义，便把西方的“天父皇上帝”看成了扫荡中国大地上“阎罗妖”的最可信赖的救星，他们在拜上帝的名义下掀起了一场席卷中国大地、纵横十八省、延续十四年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其后，随着对西方世界的了解逐步具体、逐步深入，人们开始把移植西方的坚船利炮、机器生产看成救国治世的不二法宝，为此，集中了巨大的财力、物力、人力发动了洋务运动；把移植西方的教育制度、政治制度和其他制度看成是救国治世的良方，发动了戊戌维新运动与辛亥革命；进而了解到西方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都有与其相呼应的精神文明为依托，于是发动了更新人们普遍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这一运动从十九世纪末滥觞，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发展为波澜壮阔的滚滚激流。

中国走西方之路，从中国本身来说，主要是危机意识或忧患意识的刺激，当时西方走向近代化、现代化已卓有成效，许多中国人所面对的只有这样一个成功的参照系，自然而然地便以为可以通过学习西方，使中国摆脱严重的民族危亡的命运。中国走西方之路，从世界范围来说，也正是西方资本主义通过殖民扩张和建立世界市场，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所引起的直接反应，这是一种直观式的反应，以为可以方便地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西化派很快就在实践中发现他们陷入了一种难以解脱的困

境。除去“先生”打“学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想让中国同样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之外，西化派还面临着以下三大困难：

其一，西方道路本身就是多元的。英国式，法国式，普鲁士式，俄国式，美国式，日本式，无论是经济变革上，还是政治变革、文化观念变革上，它们之间都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中国走西方之路，究竟是走英国式之路，普鲁士之路，日本之路，俄国之路，还是走法国之路，美国之路？不同社会利益集团有不同的倾向，不同的主张。

其二，西方资本主义本身正在从自我肯定走向自我否定。当中国人正满腔热忱地要求学习西方时，发现了西方自身同样存在着深刻的社会危机，犹如坐在火山之上。在西方，理性主义之外，非理性主义正在泛滥；经验主义、实证主义之外，唯意志论、生机主义、生命主义又咄咄逼人；进化论之外，虚无主义、反进化论仍在流行。批判西方社会的各种思潮，各种主张、各种社会势力，社会运动，都横陈在向西方学习的中国人面前，这就促使他们不能不思考一个问题：重复西方之路，能使中华民族真正成功吗？能使中国人“登极乐之乡”吗？事实上，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时，很早就已同时学来了否定西方的各种东西。

其三，西方之树移植于中国所固有的土壤，能够成活吗？随着对西方之路的了解稍许深入，人们就已发现，西方道路、西方模式的形成，有其源远流长的历史根源。西方资本主义由以产生和得以确立其统治地位所离不开的资本原始积累、海外殖民侵略，在中国，就缺乏它们所需要的内在动力和海外环境。中国要毕资本原始积累、产业革命和使生产成果为全体人民所共享的社会革命这三大阶段的任务于一役，实际上，是想将西方之树的根、干、花果同时为中国的土壤、气候、环境所容纳，同时在中国生根、发芽、茁壮地成长及结出硕果，结果，则恰好相反，几乎它的每一

部分都在中国激发了强烈的排斥反应。

这三大困难，仅仅靠移植西方模式，走西方之路，显然解决不了。因为事实证明，历史的创造，从来不可能凭空进行。创造历史的主体，人本身就是先前历史创造出来的，在他们身上不可能不保留有先前社会的基因。人们创造历史所凭借的全部资金、工具，包括他们所依赖的生产力、社会交往形式、各种精神财富，也无不是先前全部历史的积累与遗存。这些历史的积累与遗存不可能不制约着人们从事历史创造的方式及所能达到的限度。西方现代文明是西方先前历史发展的结果，想将西方模式现成地照搬到中国，既脱离了西方的历史与实际，更脱离了中国的历史与实际。

传统派在近代现代中国比之西化派，要更加源远流长，而且更加盘根错节与更加顽强。起初，是传统的夷夏之辨，中夏是礼义之邦，不容以夷变夏；其后，是西学源于中国说，西学虽有一些长处，但不足为奇，中国古已有之，西学祖源中国古说，所以，中国不必舍本逐末，更不可数祖忘典；再后，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西学，特别是声光化电之学，是需要学习、借鉴的，但是，中国传统之学，中国的纲常礼教，这是立国之本，是绝对不可以动摇的。再后，是西方物质文明破产，应当以东方精神文明、中国传统之学去拯救西方的东方精神文明论。

传统派中还有另外一支：康有为利用今文经学将他的变法维新主张儒学化、孔学化，甚至倡导建立孔教、立孔教为国教；章太炎与国粹主义者利用中国古代诸子学、佛学、史学及其他学说中的材料使他们的主张民族化；甚至孙中山，在其晚年，也转而盛赞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与古代道德，把他的三民主义同儒家的修齐治平粘贴起来。

这两类传统派有着基本的歧异，前者可以说是中体西用论，

后者可以说是西体中用派。他们一者从本体上，一者从形式上，都触及到了不能离开中国固有传统、不能忽视中国特殊的历史与现实这一问题。这显然包含着合理的成份。但是，坚持传统的礼教不变，或想在保持中国传统的价值取向、思维方法、行为样式以及政治经济制度、社会结构基本不变的前提下，从西方移植一部分现代物质生产方式，结局必然会使现代化遭到重重困难，使社会发展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境。而西体中用论者，他们所坚持的体，基本上没有跳出欧洲现代化模式的窠臼，他们只想将这一模式适当加以变形，使它取得一种“国粹”的形式与身份，最后，既重犯了全盘西化论者的错误，又由于对传统竭力放松了警惕，不免于重蹈中体西用论者或传统论者的覆辙。

中国历史的发展终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不存在上述全盘西化与固守传统、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或形形色色中西合璧、中西调和思想的弊端，为中国按照自己的道路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文明提供了最为锐利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过一段深刻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精髓之所在的名言：“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这一段话，表现了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特征：它的彻底的革命精神与批判精神；它的现实性与实践性；它的人民主体及严格的历史主义的科学态度。

消灭现存状况，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无畏的革命精神与批判精神。小生产的中世纪，资本主义，乃至取代资本主义而建立的新的社会，都不是凝固不变的。马克思主义要求人们自觉地站在推进历史发展的立场上，不断地变革现存状况，改造现存状况，消灭现存状况，从旧质演变为新质。马克思主义不仅对于封建主

义的小生产来说，是革命的，批判的，对于资本主义和私有制下的社会化大生产来说，对于英、美、法、俄、普、日等各种模式来说，也同样是革命的、批判的。这是传统主义或任何一种全盘西化、中西折衷调和论所无法比拟的。

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这里所说的现实的运动，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与实践性。马克思主义不是清淡而是针对现实、与现实斗争紧密相联系的科学。它以社会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践为自己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源泉，又反过来指导社会生产斗争的实践、阶级斗争的实践和科学实践。马克思决不引导人们去编制关于美好未来的幻想，或将人们的希望引向虚无缥缈不可到达的彼岸，它始终要求人们投身于改造社会的现实的运动，理论与实际紧密相结合。

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由现有的前提产生，这里所强调的现有的前提，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如何重视发挥亿万民众的历史主体精神，如何尊重客观的历史包括先前全部世代和周围整个世界所提供的全部主客观条件，如何始终不渝地将人类迄今为止所创造的全部物质、制度的、精神的财富当作自己进行变革现存世界的资料，并从这一切主客观条件中确定自己全部活动的具体目标、实际步骤及所应遵循的界限。

这样，马克思主义既总结和概括了西方现代社会、现代文明与现代科学发展的精华，而又不迷信西方现代化社会、现代文明与现代科学，坚持每一个国家都必须从自己的原有基础上进行变革与不断前进；同时，马克思主义在坚持每一个国家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必须从现有的条件出发时，反对任何固步自封、株守传统，而要求充分利用先前历史与整个世界提供的全部资源来寻求前进的正确道路；这样，它就解决了种种传统论者、西化论者、中体西用论者、西体中用论者、中西调和论者都解决不了的

两难课题。中国人民、中国历史的发展终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内在本质决定了的，同时也是中国历史经历了反复的探索、不断的挫折与失败和不断的比较之后作出的抉择。

二、马克思主义只有与中国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够指导中国社会变革胜利前进

中国人民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解马克思主义、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人民开始知道马克思这个名字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知识。当时主要通过日本，通过第二国际，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到《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文献中所阐述的一些重要观点，了解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状况，并在中国开始了宣传社会主义的一个小的热潮。孙中山解释他的三民主义，同盟会会员在《民报》的宣传中，介绍了不少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并表示了向往之意，辛亥革命成功之时，孙中山更到处演讲社会主义，中国还出现了社会党。那时，马克思主义基本上作为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派别，人们的宣传也夹杂着许多误解与曲解。

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正值中国人民深受辛亥革命失败的痛苦之际。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实际相结合的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立即吸引了先进的中国人。中国从俄国革命的胜利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力量。但是，在理论上与行动中，都是直接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看作马克思主义的真传。共产国际和列宁本人都曾注意到中国区别于西方，也有别于俄国的若干特点，但是，他们对于中国的整个情况了解毕竟有限，特别是在列宁去世以后，苏联党内斗争日趋激烈，直接影响了对于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客

观而深入的正确认识。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出现的“左”的与右的错误与此相密切联系。

中国社会大变革，或者说，中国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通过包括武装斗争在内的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意识形态的斗争等阶级斗争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为中国走向现代文明扫清最大的障碍；二是致力于创造新的社会生产力与新的生产方式，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提供最坚实的物质基础；三是通过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制度与观念的变革，使社会革命的成果真正为中国人民所掌握。这三个方面的变革，都必须立足于中国所固有的实际状况。中国最大的实际状况是什么呢？阻碍着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最大障碍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而他们掠夺、统治的主要对象正是中国的农民。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但农民旧式的生产方式、旧式的社会结构却又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统治据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必须动员广大农民，但又必须教育农民，改造农民。中国处于小生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中国工业化、中国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从它的资金的积累、劳动力的转移，直到它的原材料的供给、商品市场的扩大，都不能离开同这个汪洋大海关系的协调，二者显然是矛盾的。但从前者转向后者，必须自觉地加以调控，务必使二者不发展到尖锐的冲突，发展到激怒汪洋大海让它沸腾起来淹没逐步出现的现代化的小岛；中国最大多数的人口是农民，中国的工人和其他新的社会力量也主要脱胎于农民，要使社会革命的成果为全体人民所掌握、所共享，就不能不考虑到广大农民的利益、愿望、要求，如何使他们从旧式农民演变为新的文明的现代农民，如何协调广大农民同其他各阶级、阶层社会力量的关系，如何保持新的生产方式、新的观念、新的阶级力量即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而不为农